

# 国有股权与基于所得税费用的盈余管理\*

刘 行 杨松岩

(东北财经大学会计学院, 辽宁 大连 116025)



**内容提要:** 基于所得税对企业利润的重要影响以及所得税会计的复杂性, 企业有动机操纵所得税费用来达到盈余目标。本文采用中国上市公司 2003—2018 年的数据, 考察了国有企业与非国有企业在基于所得税费用的盈余管理行为上的差异。实证结果显示, 国有企业更有可能通过操纵所得税费用来达到盈余目标。进一步, 这一结果在地区的税收征管强度更高时、或国有企业与政府的关系更为密切从而潜在的税务稽查风险更低时(如当企业位于市场化进程较低的地区时; 国有第一大股东的持股比例较高时; 股权制衡度较弱时)更显著。

**关键词:** 国有股权 所得税费用 盈余管理

**中图分类号:** F23 **文献标志码:** A **文章编号:** 1002—5766(2021)02—0175—13

## 一、引言

一直以来, 盈余管理都是会计与金融领域的重要研究话题之一(Dechow 和 Skinner, 2000<sup>[1]</sup>; Beyer 等, 2019<sup>[2]</sup>)。盈余管理文献主要集中在如何度量企业盈余管理程度(Jones, 1991<sup>[3]</sup>; Dechow 等, 1995<sup>[4]</sup>; Burgstahler 和 Dichev, 1997<sup>[5]</sup>; Roychowdhury, 2006<sup>[6]</sup>)、盈余管理动机(Boland 和 Godsell, 2020)<sup>[7]</sup>以及盈余管理经济后果(Biddle 等, 2009<sup>[8]</sup>; Caskey 和 Ozel, 2017<sup>[9]</sup>)等。近年来, 随着相关研究不断深化, 越来越多学者开始考察企业基于具体会计账户, 如所得税(Phillips 等, 2003<sup>[10]</sup>; Dhaliwal 等, 2004<sup>[11]</sup>)、坏账准备(Jackson 和 Liu, 2010)<sup>[12]</sup>、主营业务收入(McVay, 2006)<sup>[13]</sup>、广告宣传费用(Cohen 和 Zarowin, 2010)<sup>[14]</sup>以及研发费用(Lai 等, 2020)<sup>[15]</sup>的盈余管理行为。

在不考虑税收优惠的情况下, 我国企业利润的 25% 将以税收形式上交给国家, 因此, 所得税费用账户对企业利润有重要影响。所得税会计的复杂性以及所得税费用形成过程中较多的主观估计(如, 税前亏损在未来的可弥补程度)也为企业通过所得税费用账户进行盈余管理提供了便利。Dhaliwal 等(2004)<sup>[11]</sup>认为, 所得税费用账户是研究盈余管理的“有力工具之一”, 并得到后续研究认可(Cook 等, 2008<sup>[16]</sup>; Gleason 和 Mills, 2008<sup>[17]</sup>; Bratten 等, 2017<sup>[18]</sup>; Mauler, 2019<sup>[19]</sup>)。2003—2018 年, 由证监会以及各级税务征管部门出具的上市公司违规处理文件显示, 我国上市公司通过操纵所得税费用来虚增利润的现象不在少数, 典型案例如中能电气在 2017 年因少计提所得税费等费用 1204.75 万元, 导致公司发布的业绩预告和当年实际公布的财务报告差异较大, 当年业绩由预计盈利转为亏损; 南纺股份在 2006—2010 年连续五年通过少缴纳所得税费用等手段虚增利润

收稿日期: 2020-07-14

\* 基金项目: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国有资本经营预算制度的未预期效应: 理论分析与实证检验”(71772029); 辽宁省高等学校创新人才支持项目(WR2018018)。

作者简介: 刘行, 男, 教授, 管理学博士, 研究领域是企业税收与公司财务, 电子邮箱: liuhang@dufe.edu.cn; 杨松岩, 男, 博士研究生, 研究领域是企业税收与公司财务, 电子邮箱: yangsongyan123@126.com。通讯作者: 刘行。

34449.61 万元。

本文采用中国 A 股上市公司 2003—2018 年的数据,研究了企业基于所得税费用的盈余管理行为,并考察这一行为在国有企业与非国有企业之间是否存在系统性差异。研究发现,当企业税后盈余水平无法达到预期目标时,国有企业更有可能通过操纵所得税费用来实现预期目标,支持了国有企业更可能实施基于所得税费用的盈余管理行为的论断。本文的可能贡献在于:(1)不同于对国有企业和非国有企业避税差异以及面对税收冲击时行为决策的研究(吴联生,2009<sup>[20]</sup>;刘行和李小荣,2012<sup>[21]</sup>;Bradshaw 等,2019<sup>[22]</sup>;Chow 等,2019<sup>[23]</sup>;王跃堂等,2010<sup>[24]</sup>;王跃堂等,2012<sup>[25]</sup>),本文从基于所得税费用进行盈余管理视角出发,考察了国有企业和非国有企业税收决策差异,丰富了企业税收决策领域文献;(2)本文基于所得税费用账户,研究了国有企业和非国有企业在盈余管理方面的差异,拓展了国有股权对盈余管理影响的相关文献(Chen 等,2011<sup>[26]</sup>;Jian 和 Wong,2010<sup>[27]</sup>;王焯,2010<sup>[28]</sup>)。(3)本文在 Dhaliwal 等(2004)<sup>[11]</sup>的基础上进一步发现,国有股权对企业是否实施基于所得税费用的盈余管理有直接影响,从而从股权结构视角拓展了基于所得税费用盈余管理这一支文献的相关研究(Cook 等,2008<sup>[16]</sup>;Gleason 和 Mills,2008<sup>[17]</sup>;Mauler,2019<sup>[19]</sup>)。

## 二、文献回顾

### 1. 国有股权影响会计信息质量相关文献

股权性质对企业会计信息质量会产生影响(Fan 和 Wong,2002)<sup>[29]</sup>。国有企业和非国有企业的不同企业特征使得两类企业的盈余管理动机以及会计信息质量存在显著差异(Wong,2016)<sup>[30]</sup>。有学者认为,国有企业盈余管理行为更少:Chen 等(2011)<sup>[26]</sup>从审计质量角度研究发现,国有企业盈余质量更高;薄仙慧和吴联生(2009)<sup>[31]</sup>认为,国有企业可以获得更多政府支持,盈余操纵会更少。另一部分学者则认为,国有企业盈余管理行为更多:Chen 等(2008)<sup>[32]</sup>发现,国有企业在 IPO 前进行更多盈余操纵;国有企业更倾向通过关联交易进行盈余管理(Jian 和 Wong,2010)<sup>[27]</sup>;Chen 等(2020)<sup>[33]</sup>还发现,地方国有企业会进行更多盈余管理以满足地方政府应对 GDP 考核的要求;王焯(2010)<sup>[28]</sup>从股权结构视角发现,国有企业会计信息质量随着国有股份增加而降低;戴亦一和潘越(2009)<sup>[34]</sup>发现,相比非国有企业,由于缺乏更为有效的监督机制,国有企业盈余操纵程度更大。可以看出,国有股权对会计信息质量影响的研究结论并不一致。

### 2. 国有股权影响企业税收决策相关文献

国有企业和非国有企业税收决策差异一直是研究热点。已有文献关注了国有股权对于企业税收规避的影响,但研究结论并不统一。一方面,由于与政府的密切关系,国有企业更有可能通过多缴纳税收,为政府承担其实现社会目标的支出(吴联生,2009)<sup>[20]</sup>;Bradshaw 等(2019)<sup>[22]</sup>发现,国有企业高管层为了获得职位晋升会更多缴税,承担更多税负而较少避税;刘行和李小荣(2012)<sup>[21]</sup>进一步发现,地方国有企业比中央国有企业承担了更多税负。另一方面,企业政治联系会降低税收征管有效性(Lin 等,2018)<sup>[35]</sup>,国有企业凭借天然的政治关联,可以降低其面临税务稽查的风险,从而加剧了国有企业避税程度(Chow 等,2019)<sup>[23]</sup>。部分文献还考察了税收冲击下,国有企业和非国有企业财务决策的差异。王跃堂等(2010)<sup>[24]</sup>和王跃堂等(2012)<sup>[25]</sup>基于 2007 年企业所得税改革,研究发现,国有企业资本结构和劳动力需求调整对于税收更加不敏感;王亮亮(2014)<sup>[36]</sup>发现,国有企业并不会因为企业所得税改革而跨期转移利润;王娜等(2013)<sup>[37]</sup>发现,企业所得税改革后,国有企业高管薪酬增加更为明显。综合来看,现有文献鲜有关注国有股权对基于所得税账户盈余管理行为的影响。本文试图拓展这一领域的研究。

### 3. 基于所得税费用盈余管理相关文献

所得税费用是利润表中净利润账户之前最后一个账户,因此,是企业达成盈余目标最后一次可以把握的机会(Dhaliwal等,2004)<sup>[11]</sup>。Dhaliwal等(2004)<sup>[11]</sup>从基于所得税费用盈余管理具体操作角度出发,发现企业会通过操纵第四季度的所得税费用,以使得当年净利润达到与分析家的预测一致。也有学者研究了影响企业基于所得税费用的盈余管理的因素。Cook等(2008)<sup>[16]</sup>发现,从审计师处购买了更多税收服务的企业,越有可能通过降低第四季度所得税费用来达到盈余目标;Beardsley等(2019)<sup>[38]</sup>发现,在股权激励程度更高的公司,管理层因为面临业绩压力,更倾向于操纵第四季度所得税费用进行盈余管理。还有学者研究了企业基于所得税费用盈余管理后的市场反应。Gleason和Mills(2008)<sup>[17]</sup>和Mauler(2019)<sup>[19]</sup>发现,对于那些通过操作所得税费用达到预期盈余目标的企业,投资者做出的积极反应会更少。这说明,投资者可以部分识别企业基于所得税费用的盈余管理行为。现有文献从多个视角对基于所得税费用的盈余管理行为进行了研究,但忽视了股权性质对这一行为的影响,本文尝试在此领域拓展已有研究。

## 三、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设

### 1. 国有企业更可能实施基于所得税费用的盈余管理

如前所述,所得税费用账户是企业达成盈余目标的最后一次可以把握的机会(Dhaliwal等,2004)<sup>[11]</sup>。考虑到所得税费用对企业利润的重要影响<sup>①</sup>,企业基于所得税费用的盈余管理行为有着合理的现实逻辑。

不同于其他类型盈余管理行为,企业基于所得税费用的盈余管理行为引入了新的利益相关者:税务部门。已有研究发现,当企业所得税费用账户出现异常,如会计利润与应纳税所得之间的差异较大时,企业面临的税务稽查概率会显著增加(Mills和Sansing,2000<sup>[39]</sup>;Chan等,2010<sup>[40]</sup>)。为了达到盈余目标,企业在实施基于所得税费用的盈余管理时,往往需要将所得税费用下调,这无疑会增加企业面临的税务稽查风险。因此,企业基于所得税费用的盈余管理行为需要权衡这一行为所带来的税务稽查风险大小。当企业面临的税务稽查风险越大时,企业越不可能采用这一方法来调节利润。

沿着这一逻辑,本文认为,国有企业更可能实施基于所得税费用的盈余管理行为。具体而言,因为控股股东为政府或政府所属机构或企业,国有企业拥有天然的政治关联。而企业的政治联系降低了税收征管的有效性(Lin等,2018)<sup>[35]</sup>。因此,国有企业政治身份会自然而然地降低国有企业面临的税收稽查风险。较为直接的证据是,Chow等(2019)<sup>[23]</sup>发现,相比非国有企业,一方面,国有企业的逃税行为更普遍;另一方面,当存在逃税行为时,国有企业被稽查和被处罚的可能性也更小。换言之,国有企业面临的税务稽查风险显著低于非国有企业。白云霞等(2019)<sup>[41]</sup>发现,地方政府的税务稽查显著增加了非国有企业的税收负担,而对国有企业没有显著影响。其他文献也从不同视角提供了相关的证据,如Chen等(2011)<sup>[26]</sup>发现,中国证券监管部门在执法过程中对国有企业会更为友好,表现为国有企业因为违规事件而受到的处罚程度会更轻,违规事件的处理时间也更长;Firth等(2011)<sup>[42]</sup>以企业诉讼事件为研究对象,发现当企业作为被告时,国有企业最终胜诉的概率要显著高于非国有企业。

总之,国有企业所面临的较低税务稽查风险,会使得国有企业在意图达到某种盈余目标时,更有可能通过操纵所得税费用来完成。因此,本文提出如下假设:

H<sub>a</sub>:相比非国有企业,国有企业更有可能实施基于所得税费用的盈余管理行为。

① 中国现行法定所得税税率为25%,在不考虑会计一税收差异和所得税优惠情况下,所得税费用占税前利润四分之一。

## 2. 国有企业更不可能实施基于所得税费用的盈余管理行为

基于所得税费用盈余管理行为往往需要向下调整企业所得税费用,从而达到虚增净利润的目的。这一行为可能同时导致企业的税负下降<sup>①</sup>。从这一逻辑出发,国有企业更加不可能实施基于所得税费用的盈余管理行为。具体而言,国有企业的最终控制人是政府或政府所属机构或企业,而政府同时也是税收所有者。虽然企业税负的下降可以增加企业的净利润,作为股东的政府也会享有相应的收益。但是,因为政府对税收具有独占权,而企业收益却需要和其他股东分享,所以,国有企业在实施基于所得税费用的盈余管理行为时,需要承担更高的成本(Bradshaw等,2019)<sup>[22]</sup>。这使得国有企业相对而言,不太可能实施基于所得税费用的盈余管理行为。已有文献为这一推断提供了部分佐证。从国有企业经营目标来看,由于受政府干预,国有企业经营目标往往不是公司价值最大化(Wong,2016)<sup>[30]</sup>,国有企业需要承担更多税负,为政府承担其实现社会目标的支出(吴联生,2009)<sup>[20]</sup>。当政府陷入财政危机时,国有企业还有可能缴纳更多税收以解政府燃眉之急(陈冬等,2016)<sup>[43]</sup>。从国有企业高管特征来看,其具有“准官员”身份(杨瑞龙等,2013)<sup>[44]</sup>,可能通过更多缴税以获得政治晋升(Bradshaw等,2019)<sup>[22]</sup>。作为“准官员”,国有企业高管也不希望承担由于激进避税带来的“隐性成本”(Hanlon和Heitzman,2010)<sup>[45]</sup>。可见,在国有企业税收决策中,节税并不是考虑重点,缴税反而是更经常发生的行为。因此,本文提出如下假设:

H<sub>b</sub>:相比非国有企业,国有企业更加不可能实施基于所得税费用的盈余管理行为。

## 四、研究设计

### 1. 样本选择与数据来源

本文选取了我国A股上市公司作为研究样本,样本期间为2003—2018年<sup>②</sup>。在初始样本的基础上,本文剔除了如下的样本:(1)金融行业样本;(2)公司第三季度和第四季度税前利润小于等于0的样本<sup>③</sup>;(3)第三季度和第四季度所得税费用小于等于0的样本<sup>④</sup>;(4)变量缺失样本。最终,本文得到涉及3313家上市公司的共计23676家公司-年度数据。本文数据均来源于CSMAR数据库。

### 2. 实证模型与变量定义

为检验国有企业是否更倾向于运用所得税费用进行盈余管理,本文设定被解释变量 $EMBITE$ 为二值虚拟变量,构建了如下实证模型(1),进行基于Probit分布的回归分析。

$$Probit(EMBITE) = \beta_0 + \beta_1 SOE + \beta_2 Ln(Assets) + \beta_3 ROA + \beta_4 LEV + \beta_5 BTM + \beta_6 DUAL + \beta_7 TOP1 + \beta_8 Ratio + \beta_9 IndRatio + \beta_{10} Big4 + \mu + \eta + \theta + \varepsilon \quad (1)$$

(1)被解释变量 $EMBITE$ (earnings management based on income tax expense),用于衡量企业是否实施基于所得税费用的盈余管理。采用以下步骤对 $EMBITE$ 赋值:

第一,界定盈余管理目标。Lu等(2019)<sup>[46]</sup>的研究显示,中国上市公司高管更倾向于将上年年末每股收益 $EPS_{t-1}$ 而非分析师预测作为当年盈余目标。因此,本文将公司上年年末每股收益

① 所得税费用与企业实际缴纳所得税并非同一概念,无法直接等同。但是,企业不太可能全部通过非应税项目来降低所得税费用。因此,影响所得税费用的行为也会在很大程度上影响到企业实际缴纳的所得税。

② 始于2003年,是因为数据库仅提供2003年后公司实际控制人信息,以供识别上市公司实际控制人性质,甄别国有企业。

③ 在后文构建公司基于所得税费用盈余管理指标时,需要采用公司第三季度和第四季度实际所得税率数据。当税前利润等于0时,企业的实际所得税率( $ETR$ ,等于所得税费用/税前利润)无法计算;当税前利润小于0时,所得税费用/税前利润取值不具经济意义。

④ 这一剔除也是为了防止 $ETR$ 的计算误差。这种处理方法与企业税收研究通行做法一致(吴联生,2009<sup>[20]</sup>,Chan等,2010<sup>[40]</sup>)。

$EPS_{t-1}$ 作为当年盈余目标阈值。

第二,计算未操纵所得税费用时的每股收益  $EPS_{induced}$ 。Dhaliwal 等(2004)<sup>[11]</sup>认为,第三季度实际所得税率  $ETR_3$  是企业当年度未经操纵的实际所得税率的理想度量<sup>①</sup>。本文采用第三季度实际所得税率  $ETR_3$  估算企业未操纵所得税费用时每股收益  $EPS_{induced}$ ,即  $EPS_{induced} = \text{税前利润} \times (1 - ETR_3) / \text{股本}$ 。

第三,确定  $EMBITE$  取值。比较  $EPS_{t-1}$ 、 $EPS_{induced}$  以及当年末实际每股收益  $EPS_t$ ,如果  $EPS_{induced} < EPS_{t-1} < EPS_t$  (即未操纵所得税费用每股收益小于盈余目标阈值,但实际的每股收益超过了盈余目标阈值),则认定企业当年实施了基于所得税费用的盈余管理, $EMBITE$  取值为 1,否则,为 0。

(2)解释变量  $SOE$ ,即国有企业属性。 $SOE$  表示上市公司最终控制人属性。如果上市公司最终控制人为政府或政府所属机构或企业,则认定为国有企业,并将  $SOE$  赋值为 1,否则为 0。

(3)控制变量。借鉴叶康涛和刘行(2011)<sup>[48]</sup>,本文在模型(1)中加入如下控制变量:公司规模  $Ln(Assets)$ ,以公司年末总资产自然对数衡量;资产收益率  $ROA$ ,等于公司年末净利润除以总资产;资产负债率  $LEV$ ,等于公司年末总负债除以总资产;成长性  $BTM$ ,用账市比表示,等于公司年末账面价值除以市场价值;CEO 和董事长是否两职合一  $DUAL$ ,两职合一取 1,否则,为 0;股权集中度  $TOP1$ ,等于公司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股权制衡度  $Ratio$ ,等于公司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除以第二至第十大股东持股比例;独立董事比例  $IndRatio$ ,用独立董事人数与董事会人数之比表示;审计师性质  $Big4$ ,公司年度财务报表由“四大”会计师事务所审计,则赋值为 1,否则,为 0。本文主要变量定义如表 1 所示。本文还控制了年度效应  $\mu$ 、行业效应  $\eta$  以及地区(公司注册地所属省份)效应  $\theta$ 。

表 1 主要变量定义

变量名称	变量符号	变量定义
基于所得税费用的盈余管理	$EMBITE$	是否实施基于所得税费用的盈余管理,是则取 1,否则为 0。
国有企业属性	$SOE$	公司最终控制人为政府或政府所属机构或企业,则赋值 1,否则,为 0
公司规模	$Ln(Assets)$	公司年末总资产的自然对数
资产收益率	$ROA$	公司年末净利润除以总资产
资产负债率	$LEV$	公司年末总负债除以总资产
成长性	$BTM$	以账市比衡量,等于公司年末账面价值除以市场价值
两职合一	$DUAL$	CEO 和董事长是否两职合一,是则赋值 1,否则,为 0
股权集中度	$TOP1$	公司第一大股东的持股比例
股权制衡度	$Ratio$	公司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除以第二至第十大股东持股比例
独立董事比例	$IndRatio$	公司独立董事人数除以董事会总人数
审计师性质	$Big4$	公司年度财务报表由“四大”审计,则赋值 1,否则,赋值 0

资料来源:本文整理

## 五、实证结果与分析

### 1. 描述性统计

本文主要变量的描述性统计结果如表 2 所示。为防止异常值对回归结果的影响,本文对所有连续变量上下 1% 分位数的值进行了缩尾处理。从表 2 可以看出, $EMBITE$  的平均值为 0.026,这说

① Das 等(2009)<sup>[47]</sup>发现,企业盈余管理行为往往集中在第四季度,第三季度所得税费用较少受到盈余管理行为影响。此外,第三季度实际所得税率  $ETR_3$  会综合企业税收筹划的影响,而税收筹划策略在全年间不会有大的调整。企业可能通过调整第三季度实际所得税率  $ETR_3$  到第四季度实际所得税率  $ETR_4$  来进行基于所得税费用的盈余管理。

明样本中约有 2.6% 的观测值通过操纵所得税费用来避免业绩下滑; *SOE* 的平均值为 0.458, 意味着本文的样本中有 45.8% 的观测值为国有企业; *TOP1* 的平均值为 0.366, 意味着第一大股东的持股比例平均达 36.6%。其他控制变量的结果与企业现实基本一致。

表 2 主要变量描述性统计

变量	观测值	平均值	中位数	标准差	25% 分位数	75% 分位数
<i>EMBITE</i>	23676	0.026	0.000	0.158	0.000	0.000
<i>SOE</i>	23676	0.458	0.000	0.498	0.000	1.000
<i>Ln(Assets)</i>	23676	22.020	21.840	1.252	21.100	22.720
<i>ROA</i>	23676	0.051	0.042	0.039	0.022	0.069
<i>LEV</i>	23676	0.435	0.436	0.199	0.280	0.588
<i>BTM</i>	23676	0.645	0.657	0.238	0.460	0.839
<i>Dual</i>	23676	0.224	0.000	0.417	0.000	0.000
<i>Top1</i>	23676	0.366	0.349	0.153	0.244	0.477
<i>Ratio</i>	23676	3.789	1.597	6.192	0.848	3.809
<i>IndRatio</i>	23676	0.367	0.333	0.052	0.333	0.400
<i>Big4</i>	23676	0.060	0.000	0.024	0.000	0.000

资料来源:本文整理

## 2. 多元回归结果

模型(1)的多元回归结果如表 3 所示。表 3 中,(1)列只加入了年度固定效应和行业固定效应作为控制变量,*SOE* 的回归系数在 5% 的置信水平显著为正;(2)列中,增加了除地区效应之外的其他控制变量,*SOE* 的回归系数仍然显著为正;(3)列中,进一步控制了地区固定效应,*SOE* 的回归系数在 1% 的置信水平下显著为正。据此,表 3 的结果支持了假设  $H_a$ , 不支持假设  $H_b$ , 即国有企业因为面临较低的税务稽查风险,从而更有可能通过操纵所得税费用来达到既定的盈余目标。

表 3 国有企业是否更倾向于运用所得税费用进行盈余管理

变量	(1)		(2)		(3)	
	回归系数	<i>z</i> 值	回归系数	<i>z</i> 值	回归系数	<i>z</i> 值
<i>SOE</i>	0.101 **	2.45	0.110 **	2.51	0.119 ***	2.63
<i>Ln(Assets)</i>			-0.054 **	-2.24	-0.058 **	-2.39
<i>ROA</i>			-2.895 ***	-4.51	-2.791 ***	-4.33
<i>LEV</i>			0.343 ***	2.78	0.368 ***	2.95
<i>BTM</i>			-0.131	-1.00	-0.113	-0.85
<i>Dual</i>			0.035	0.74	0.029	0.61
<i>Top1</i>			-0.175	-1.18	-0.216	-1.43
<i>Ratio</i>			-0.001	-0.13	0.001	0.03
<i>IndRatio</i>			0.316	0.88	0.362	1.00
<i>Big4</i>			0.048	0.57	0.044	0.53
常数项	-2.344 ***	-10.48	-1.214 **	-2.48	-1.084 **	-2.13
年度效应和行业效应	控制		控制		控制	
地区效应	不控制		不控制		控制	
观测值	23676		23676		23676	
伪 $R^2$	0.02		0.03		0.04	

注:\*\*\*、\*\*和\*分别表示系数在 1%、5% 和 10% 的置信水平显著;回归系数的标准误为稳健标准误并在公司层面进行了 Cluster 调整

资料来源:本文整理

### 3. 稳健性检验

(1) 更换盈余管理目标。在本文的基准回归中,将样本企业上年末每股收益  $EPS_{i-1}$  作为盈余管理目标。避免亏损也是企业的重要盈余管理目标 (Burgstahler 和 Dichev, 1997)<sup>[5]</sup>。特别是考虑到中国的 ST 制度,避免亏损的盈余管理目标在中国具有较强的现实基础。基于此,本文将避免亏损作为盈余管理目标进行了稳健性测试。具体而言,本文仍然将第三季度的实际所得税率作为企业当年度未操纵所得税费用时的实际所得税率,并通过它估算企业未操纵所得税费用净利润  $NetIncome_{induced}$ 。其中,  $NetIncome_{induced} = \text{年末税前利润} \times (1 - ETR_3)$ 。之后,如果  $NetIncome_{induced} < 0 < NetIncome_t$  (即未操纵所得税费用净利润小于 0,但实际净利润大于 0),则意味着企业通过操纵所得税费用来避免亏损。此时,  $EMBITE$  被赋值为 1,否则为 0。避免亏损作为盈余管理目标的回归结果如表 4 所示。从表 4 可以看到,  $SOE$  的回归系数仍然显著为正,这进一步印证了表 3 的结论,本文研究结论具有较好的稳健性。

表 4 将避免亏损作为企业的盈余管理目标回归结果

变量	回归系数	z 值	回归系数	z 值	回归系数	z 值
$SOE$	0.175 **	2.23	0.148 *	1.70	0.160 *	1.78
控制变量	不控制		控制		控制	
时间效应和行业效应	控制		控制		控制	
地区效应	不控制		不控制		控制	
观测值	23676		23676		23676	
伪 $R^2$	0.04		0.19		0.21	

注:\*\*\*、\*\*和\*分别表示系数在 1%、5%和 10%的置信水平显著;回归系数的标准误为稳健标准误并在公司层面进行了 Cluster 调整;截距项结果未列示;控制变量与表 2 一致,限于篇幅,未列示,备索,下同

资料来源:本文整理

(2) 排除会计准则与税收制度变迁的影响。在本文的样本期间,我国经历了一次重大会计准则变革与一次企业所得税制度改革。我国于 2007 年开始采用 IFRS,并要求企业统一采用资产负债表债务法对所得税进行核算<sup>①</sup>。此外,我国于 2008 年对企业所得税法进行了较大幅度调整。已有研究发现,在税法改革的附近年度,企业进行了大量以降低税负为目的的盈余管理 (王跃堂等, 2009)<sup>[49]</sup>。为了排除会计准则与税收制度变迁对本文结论的影响,也为了避免 2007 年会计准则改革之前企业采用不同所得税核算方法所带来的不同公司间所得税费用账户的不可比,本文调整样本期间为 2009—2018 年,重新对假设 H 进行实证检验,回归结果如表 5 所示。从表 5 可以看出,  $SOE$  的回归系数依然显著为正。

表 5 调整样本期间回归结果

变量	回归系数	z 值	回归系数	z 值	回归系数	z 值
$SOE$	0.128 ***	2.63	0.132 **	2.56	0.132 **	2.46
控制变量	不控制		控制		控制	
时间效应和行业效应	控制		控制		控制	
地区效应	不控制		不控制		控制	
观测值	18179		18179		18179	
伪 $R^2$	0.02		0.03		0.04	

资料来源:本文整理

① 在这之前,企业可以自由选择通过应付税款法、基于利润表的纳税影响会计法或基于资产负债表的纳税影响会计法对所得税进行核算。

(3)采用面板 Probit 模型进行再估计。为了克服样本时间跨度较长对于研究结论的影响,本文还基于随机效应和平均效应的面板 Probit 模型进行回归,结果如表 6 所示。从表 6 可以看出,基于随机效应和平均效应的面板 Probit 模型中,*SOE* 估计系数均显著为正,而且估计系数未发生明显变化。这进一步说明本文结论是稳健的。

表 6 面板 Probit 模型的回归:随机效应和平均效应

变量	随机效应		平均效应	
	回归系数	z 值	回归系数	z 值
<i>SOE</i>	0.123 ***	2.66	0.119 ***	2.62
控制变量	控制		控制	
时间和行业效应	控制		控制	
地区效应	控制		控制	
观测值	23676		23676	
伪 R <sup>2</sup>	0.04		0.04	

资料来源:本文整理

## 六、进一步分析

### 1. 税收征管强度的影响

前文实证结果显示,国有企业更可能实施基于所得税费用的盈余管理。理论分析认为,这源于国有企业面临较小的税务稽查风险。为了进一步佐证该理论逻辑,本文进一步考察了税收征管强度的影响。如果国有企业基于所得税费用的盈余管理程度较高,是因为国有企业面临较低的税务稽查风险的话,那么应该可以观察到,国有企业的盈余管理行为在税收征管强度更高的地区(从而税务稽查风险较高)会更为显著。为了验证这一逻辑,借鉴曾亚敏和张俊生(2009)<sup>[50]</sup>以及叶康涛和刘行(2011)<sup>[48]</sup>的方法,根据下面式(2)和式(3)计算各地区的税收征管强度 *TE*。

$$T_{i,t}/GDP_{i,t} = \alpha_0 + \alpha_1 IND1_{i,t}/GDP_{i,t} + \alpha_2 IND2_{i,t}/GDP_{i,t} + \alpha_3 OPENESS_{i,t}/GDP_{i,t} + \varepsilon \quad (2)$$

$$TE_{i,t} = (T_{i,t}/GDP_{i,t}) / (T_{i,t}/GDP_{i,t\_EST}) \quad (3)$$

其中, $T_{i,t}/GDP_{i,t}$ 表示上市公司所在省份当年税收收入除以 GDP;*IND1*、*IND2* 分别表示各地区当年第一产业、第二产业的产值数额;*OPENESS* 度量的是上市公司所在省份开放程度,等于各地区当年进出口总额。对式(2)进行回归后,得到各变量的估计系数。在此基础上,计算出预期的  $T_{i,t}/GDP_{i,t}$ ,即  $T_{i,t}/GDP_{i,t\_EST}$ 。用各地区实际税收收入与预期税收收入之比来衡量税收征管强度 *TE*。*TE* 越大,表示该地区的税收征管强度越高。

本文根据 *TE* 的年度中位数将样本观测值分为两组,分别对模型(1)进行回归,结果如表 7 所示。从表 7 可以看出,在税收征管强度更高的地区,国有企业更有可能实施基于所得税费用的盈余管理。但是,在税收征管强度更低的地区,国有企业和非国有企业是否实施基于所得税费用盈余管理没有显著差异。这进一步佐证了本文的理论逻辑。

表 7 税收征管强度的影响

变量	税收征管强度较高		税收征管强度较低	
	回归系数	z 值	回归系数	z 值
<i>SOE</i>	0.144 **	2.44	0.096	1.47
控制变量	控制		控制	
时间、行业及地区效应	控制		控制	



续表 7

变量	税收征管强度较高		税收征管强度较低	
	回归系数	z 值	回归系数	z 值
观测值	12646		11030	
伪 R <sup>2</sup>	0.04		0.05	

资料来源:本文整理

### 2. 地区市场化进程的影响

市场化进程是衡量我国外部制度环境的重要指标之一(樊纲和王小鲁,2004)<sup>[51]</sup>。地区市场化程度越低,政府在该地区扮演的角色越重要,企业受到的政府干预程度越高。而作为一种外部治理机制,市场化进程能够抑制盈余管理(王亮亮等,2013)<sup>[52]</sup>。在本文的情景下,位于较低市场化程度地区的国有企业会越有可能因为政企关联而更多实施基于所得税费用的盈余管理。为了实证考察这一预期,本文按照当年度地区市场化进程的中位数<sup>①</sup>,将样本观测值分为市场化进程较低组和市场化进程较高组,对模型(1)进行分组回归,结果如表 8 所示。从表 8 可以看出,在市场化程度较低的样本组,SOE 的回归系数在 1% 的置信水平显著为正;然而,在市场化程度较高的样本组,SOE 的回归系数虽然为正,但不显著。

表 8 地区市场化进程的影响

变量	市场化进程较低		市场化进程较高	
	回归系数	z 值	回归系数	z 值
SOE	0.268 ***	2.78	0.082	1.59
控制变量	控制		控制	
时间、行业及地区效应	控制		控制	
观测值	4618		19058	
伪 R <sup>2</sup>	0.09		0.04	

资料来源:本文整理

### 3. 股权集中度与股权制衡度的影响

本文还从股权集中度与股权制衡度视角进一步考察了股权结构对本文结论的影响。之所以从股权集中度视角展开考察,仍然是为了进一步验证本文理论逻辑。国有企业大股东一般为政府(部门),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越高,意味着国有企业与政府的关系越密切。例如,当政府对国有企业的持股比例超过 50% 时,政府对国有企业拥有控制权。此时,政府可以直接任免国有企业的主要高管,且高管也更有可能是具有政府背景,从而,国企高管与政府各部门的沟通与交流会更加密切。这会进一步降低国有企业税务稽查风险。从这一逻辑出发,当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越高(股权集中度越高)时,国有企业越可能基于所得税费用实施盈余管理行为。为了印证这一预期,本文按照当年度样本观测值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的中位数,将样本观测值分为股权集中度较高和较低两组,分别对模型(1)进行回归,结果如表 9 所示。从表 9 可以看出,SOE 的回归系数仅在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较高的样本公司显著为正,这印证了上述推断。

理论上,当其他股东对第一大股东制衡作用更强时,第一大股东能够发挥的影响可能会更小。已有研究也证实,当股权制衡机制更有效时,能够更好地抑制盈余管理行为(张娟和黄志忠,

<sup>①</sup> 市场化指数得分来自于樊纲等(2011)<sup>[53]</sup>和王小鲁等(2019)<sup>[54]</sup>。由于市场化指数只披露至 2016 年,2017 年和 2018 年的市场化指数按照各省份 2003—2016 年市场化指数得分的平均增长率进行推算。

2014)<sup>[55]</sup>。具体到本文关注的国有企业,股权制衡度更高时,第一大国有股东对企业的影响程度会受到削弱,从而国有企业基于所得税费用的盈余管理行为可能也会下降。为了印证这一预期,本文界定股权制衡度等于公司第二至第十大股东持股比例之和除以第一大股东的持股比例。本文按照当年度样本观测值股权制衡度的中位数,将数据分为股权制衡度较高和较低两组,分别对模型(1)进行回归,结果如表9所示。从表9可以看出,SOE的回归系数仅在股权制衡度较低的样本公司显著为正,这印证了上述推断。

表9 股权集中度与股权制衡度的影响

变量	股权集中度较高		股权集中度较低		股权制衡度较高		股权制衡度较低	
	回归系数	z 值	回归系数	z 值	回归系数	z 值	回归系数	z 值
SOE	0.146**	2.17	0.099	1.62	0.102	1.52	0.145***	2.22
控制变量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时间、行业、地区效应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观测值	11665		12011		11925		11751	
伪 R <sup>2</sup>	0.04		0.06		0.04		0.09	

资料来源:本文整理

## 七、结论与讨论

本文考察了国有股权对基于所得税费用盈余管理的影响。实证结果显示,国有企业更可能实施基于所得税费用的盈余管理。本文结论为国有股权对企业税收行为和盈余管理行为的影响提供了新的证据,也进一步拓展了基于所得税费用的盈余管理领域的相关研究。

根据本文的研究结论,可以获得如下启示:第一,税收征管部门在税收征管过程中要更加注重公平性,消除产权所有制歧视。基于本文结论,国有企业与政府的密切关系会促使国有企业实施更多基于所得税费用的盈余管理活动。结合Chow等(2019)<sup>[23]</sup>的发现,国有企业会更多逃税且逃税之后遭受处罚更少。因此,税收征管部门应当注重公平,维护良好的征税环境。

第二,投资者在利用所得税费用估值时,要注意国有股权对所得税费用信息扭曲的现象。所得税费用和税后净利润这两个指标分别受到税法和会计准则约束,从不同角度提供了企业估值的相关信息。已有研究发现,投资者充分利用了所得税费用指标所提供的信息对企业估值(Hanlon和Shevlin,2005<sup>[56]</sup>;伍利娜和李蕙伶,2007<sup>[57]</sup>)。然而,由于国有企业股权性质的影响,可能会使所得税费用信息失真,从而影响投资者的决策。因此,投资者在运用所得税费用信息进行决策时,需要充分评估股权性质的影响。

第三,国有资产监督部门在考核国有企业高管时,应当更加关注税前利润而非税后利润。虽然在一定程度上,国有企业是政府目标的执行者,其行为可能会偏离市场规则。但是,国有企业(特别是上市国有企业)也有着利润目标,其管理层会面临各种业绩考核的压力。这使得国有企业的管理层也有动机通过盈余管理行为来调节利润。国有资产监督部门关注企业的税前利润可以降低国企的逃税动机,使得政府的财政收入更有保障。

本文还存在一些不足之处:一是,本文只揭示了国有企业更可能通过操纵所得税费用进行盈余管理这一现象,而未对这一现象可能产生的后续影响,如资本市场与监管机构对此行为的反应,做出更加深入的探讨;二是,由于数据获取方面的局限性,本文只能用有效税率来度量企业的纳税情况。而实际的税收征缴可能与报表中的所得税费用并不完全一致。随着与税收相关数据披露程度的不断提高,可以对研究进行深入拓展。

参考文献

- [1] Dechow P. M. , and D. J. Skinner Earnings Management: Reconciling the Views of Accounting Academics, Practitioners, and Regulators[J]. Accounting Horizons,2000,14,(2):235-250.
- [2] Beyer A. ,I. ,Guttman and I. Marinovic. Earnings Management and Earnings Quality: Theory and Evidence[J]. The Accounting Review,2019,94,(4):77-101.
- [3] Jones J. J. Earnings Management During Import Relief Investigations [J]. Journal of Accounting Research, 1991, 29, (2): 193-228.
- [4] Dechow P. M. , R. G. , Sloan and A. P. Sweeney, Detecting Earnings Management [J]. Accounting Review, 1995, 70, (2): 193-225.
- [5] Burgstahler D. , and Dichev I. Earnings Management to Avoid Earnings Decreases and Losses [J]. Journal of Accounting and Economics,1997,24,(1):99-126.
- [6] Roychowdhury S. Earnings Management Through Real Activities Manipulation[J]. Journal of Accounting and Economics,2006,42,(3):335-370.
- [7] Boland M. ,and Godsell D. Local Soldier Fatalities and War Profiteers: New Tests of the Political Cost Hypothesis[J]. Journal of Accounting and Economics,2020,70,(1):101316.
- [8] Biddle G. C. , Hilary G. , and Verdi R S. How Does Financial Reporting Quality Relate to Investment Efficiency? [J]. Journal of Accounting and Economics,2009,48,(2-3):112-131.
- [9] Caskey J. , and Ozel N B. Earnings Expectations and Employee Safety [J]. Journal of Accounting and Economics,2017,63,(1):121-141.
- [10] Phillips J. ,Pincus M. ,and Rego S O. Earnings Management: New Evidence Based on Deferred Tax Expense [J]. The Accounting Review,2003,78,(2):491-521.
- [11] Dhaliwal D S. , Gleason C A. , and Mills L F. Last—Chance Earnings Management: Using the Tax Expense to Meet Analysts' Forecasts [J]. Contemporary Accounting Research,2004,21,(2):431-459.
- [12] Jackson S B. , and Liu X. The Allowance for Uncollectible Accounts, Conservatism, and Earnings Management [J]. Journal of Accounting Research,2010,48,(3):565-601.
- [13] McVay S E. Earnings Management Using Classification Shifting: An Examination of Core Earnings and Special Items [J]. The Accounting Review,2006,81,(3):501-531.
- [14] Cohen D A. , and Zarowin P. Accrual-Based and Real Earnings Management Activities Around Seasoned Equity Offerings [J]. Journal of Accounting and Economics,2010,50,(1):2-19.
- [15] Lai S. ,Li Z. , and Yang Y G. East, West, Home's Best; Do Local CEOs Behave Less Myopically? [J]. The Accounting Review, 2020,95,(2):227-255.
- [16] Cook K A. , Huston G R. , and Omer T C. Earnings Management Through Effective Tax Rates: The Effects of Tax Planning Investment and the Sarbanes-Oxley Act of 2002 [J]. Contemporary Accounting Research,2008,25,(2):447-471.
- [17] Gleason C A. , and Mills L F. Evidence of Differing Market Responses to Beating Analysts' Targets Through Tax Expense Decreases [J]. Review of Accounting Studies,2008,13,(2-3):295-318.
- [18] Bratten B. ,Gleason C A. , and Larocque S A. Forecasting Taxes: New Evidence from Analysts [J]. The Accounting Review,2017,92,(3):1-29.
- [19] Mauler L M. The Effect of Analysts' Disaggregated Forecasts on Investors and Managers: Evidence Using Pre-Tax Forecasts [J]. The Accounting Review,2019,94,(3):279-302.
- [20] 吴联生. 国有股权、税收优惠与公司税负 [J]. 北京: 经济研究,2009,(10):109-120.
- [21] 刘行, 李小荣. 金字塔结构、税收负担与企业价值: 基于地方国有企业的证据 [J]. 北京: 管理世界,2012,(8):91-105.
- [22] Bradshaw M. ,Liao G. , and Ma M S. Agency Costs and Tax Planning When the Government is A Major Shareholder [J]. Journal of Accounting and Economics,2019,67,(2-3):255-277.
- [23] Chow T. ,B. Ke, and H. Yuan. What Types of Publicly Listed Firms Evade Taxes? Evidence from China [R]. SSRN Working Paper,2019.
- [24] 王跃堂, 王亮亮, 彭洋. 产权性质、债务税盾与资本结构 [J]. 北京: 经济研究,2010,(9):122-136.
- [25] 王跃堂, 王国俊, 彭洋. 控制权性质影响税收敏感性吗? ——基于企业劳动力需求的检验 [J]. 北京: 经济研究,2012,(4):52-63.
- [26] Chen H. ,J. Z. Chen, and G. J. Lobo. Effects of Audit Quality on Earnings Management and Cost of Equity Capital: Evidence from

China[J]. *Contemporary Accounting Research*,2011,28,(3):892-925.

[27] Jian M., and T. J. Wong Propping Through Related Party Transactions[J]. *Review of Accounting Studies*,2010,15,(1):70-105.

[28] 王焯. 国有控股、股权控制链与盈余质量[J]. 北京:经济管理,2010,(2):104-111.

[29] Fan J. P. H., and T. J. Wong. Corporate Ownership Structure and the Informativeness of Accounting Earnings in East Asia[J]. *Journal of Accounting and Economics*,2002,33,(3):401-425.

[30] Wong T. J. Corporate Governance Research on Listed Firms in China: Institutions, Governance and Accountability[J]. *Foundations and Trends in Accounting*, 2016,9,(4):259-326.

[31] 薄仙慧,吴联生. 国有控股与机构投资者的治理效应:盈余管理视角[J]. 北京:经济研究,2009,(2):81-91,160.

[32] Chen X., C. W. J. Lee, and J. Li. Government Assisted Earnings Management in China[J]. *Journal of Accounting and Public Policy*,2008,27,(3):262-274.

[33] Chen X., Q. Cheng, and Y. Hao. GDP Growth Incentives and Earnings Management: Evidence from China[J]. *Review of Accounting Studies*,2020,25,(3):1002-1039.

[34] 戴亦一,潘越. 金字塔结构、最终控制者性质与盈余操纵——来自我国上市公司的经验证据[J]. 北京:经济管理,2009,(10):115-120.

[35] Lin K. Z., L. F. Mills, and F. Zhang. Do Political Connections Weaken Tax Enforcement Effectiveness? [J]. *Contemporary Accounting Research*,2018,35,(4):1941-1972.

[36] 王亮亮. 税制改革与利润跨期转移——基于“账税差异”的检验[J]. 北京:管理世界,2014,(11):105-118.

[37] 王娜,王跃堂,王亮亮. 企业所得税影响公司薪酬政策吗? ——基于企业所得税改革的经验研究[J]. 北京:会计研究,2013,(5):35-42,95.

[38] Beardsley E., M. Kara, and C. D. Weaver. Incentives, Opportunities, and Earnings Management Using Tax Expense[R]. SSRN Working Paper,2019.

[39] Mills L. F., and R. C. Sansing. Strategic Tax and Financial Reporting Decisions: Theory and evidence [J]. *Contemporary Accounting Research*,2000,17,(1):85-106.

[40] Chan K. H., K. Z. Lin, and P. L. L. Mo. Will A Departure from Tax-Based Accounting Encourage Tax Noncompliance? Archival Evidence from A Transition Economy[J]. *Journal of Accounting and Economics*,2010,50,(1):58-73.

[41] 白云霞,唐伟正,刘刚. 税收计划与企业税负[J]. 北京:经济研究,2019,(5):98-112.

[42] Firth M., O. M. Rui, and W. Wu. The Effects of Political Connections and State Ownership on Corporate Litigation in China[J]. *The Journal of Law and Economics*,2011,54,(3):573-607.

[43] 陈冬,孔墨奇,王红建. 投我以桃,报之以李:经济周期与国企避税[J]. 北京:管理世界,2016,(5):46-63.

[44] 杨瑞龙,王元,聂辉华. “准官员”的晋升机制:来自中国央企的证据[J]. 北京:管理世界,2013,(3):23-33.

[45] Hanlon M., and S. Heitzman. A Review of Tax Research[J]. *Journal of Accounting and Economics*,2010,50,(2-3):127-178.

[46] Lu, H., Shin, J. E., and M. Zhang. Financial Reporting and Disclosure Practices in China[R]. SSRN Working Paper,2019

[47] Das S., Shroff P. K., and H. Zhang. Quarterly Earnings Patterns and Earnings Management [J]. *Contemporary Accounting Research*,2009,26,(3):797-831.

[48] 叶康涛,刘行. 税收征管、所得税成本与盈余管理[J]. 北京:管理世界,2011,(5):140-148.

[49] 王跃堂,王亮亮,贡彩萍. 所得税改革、盈余管理及其经济后果[J]. 北京:经济研究,2009,(3):86-98.

[50] 曾亚敏,张俊生. 税收征管能够发挥公司治理功用吗? [J]. 北京:管理世界,2009,(3):143-151,158.

[51] 樊纲,王小鲁. 中国市场化指数——各地区市场化进程 2004 年度报告[M]. 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2004.

[52] 王亮亮,王跃堂,王娜. 市场化进程、真实活动盈余管理与公司未来业绩[J]. 北京:经济管理,2013,(9):101-112.

[53] 樊纲,王小鲁,朱恒鹏. 中国市场化指数——各地区市场化进程 2011 年度报告[M]. 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2011.

[54] 王小鲁,樊纲,胡李鹏. 中国市场化指数(2018)[M]. 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9.

[55] 张娟,黄志忠. 盈余管理异质性、公司治理和高管薪酬——基于中国上市公司的实证研究[J]. 北京:经济管理,2014,(9):79-90.

[56] Hanlon M., and T. Shevlin. Evidence for The Possible Information Loss of Conforming Book Income and Taxable Income[J]. *The Journal of Law and Economics*,2005,48,(2):407-442.

[57] 伍利娜,李惠伶. 投资者理解公司会计利润和应税利润的差异信息吗? [J]. 北京:管理世界,2007,(10):114-121,138.

# State Ownership and Earnings Management Based on Income Tax Expense

LIU Hang, YANG Song-yan

(School of Accounting, Dongbei University of Finance and Economics, Dalian, Liaoning, 116025, China)

**Abstract:** Income tax has a very important impact on firm profit and income tax accounting is very complexity, so enterprises have incentives to achieve earnings targets by manipulating income tax related accounts. This paper examines the difference between state-owned enterprises (SOEs) and non-state-owned enterprises (NSOEs) in earnings management activity based on income tax expense account. Using data on Chinese listed firms from 2003 to 2018, empirical results show that SOEs are more likely to manipulate income tax expense to achieve earnings targets than NSOEs. Furthermore, such a result is concentrated on firms that are in regions with higher tax enforcement and firms that are more closely related to government and thus have a lower probability of tax inspections (e.g., for firms that are in provinces with lower marketization and firms whose largest state shareholders hold higher ownership and firms that are in weak restraint of ownership balance).

More precisely, our contributions can be highlighted as follows. First of all, different from existing studies on differences in tax avoidance and differences in decision-making to cope tax shocks, this paper investigates the differences of corporate tax decisions from the perspective upon earnings management based on income tax expense between SOEs and NSOEs. In the second place, this paper studies the differences in earnings management between SOEs and NSOEs. This paper expands the literature on the impact of state ownership on earnings management through the specific accounting account of income tax expense. Thirdly, we find that, based on Dhaliwal et al. (2004) and related following-up researches, Chinese listed firms also have manipulated earnings through income tax expense and state ownership affects earnings management based on income tax expense. This paper extends the related literatures of earnings management based on income tax expense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state ownership.

There're at least three enlightenments from this paper. Firstly, our results have implications for tax collecting departments to keep justice during their tax collecting work. SOEs prefer earnings management based on income tax expense due to their close relationship to government. This relationship can protect SOEs away from punishments. Therefore, it is important to maintain justice environment in the process of tax enforcement.

Secondly, this paper can give some enlightenments for investors in the capital markets when they use income tax expense to make decisions. Restrained by the tax law and accounting principles, income tax expense and earnings after tax provide different information on corporate valuation. Close relationship between SOEs and government may weaken the usefulness of income tax expense. Therefore, investors should distinguish SOEs and NSOEs when they use income tax expense to make decisions.

Thirdly, state assets supervision department should pay attention to their evaluation mechanism and more emphasize the objective indicators, such as earnings before tax income. To some extent, SOEs are the implementers of government goals. Their actions may deviate from market rules. However, the managers of SOEs (especially listed SOEs) still are confronted pressure from different types of performance evaluations. That could be the motivation that managers have incentives to manipulate earnings based on income tax expense. State assets supervision department could adjust their evaluation indicator, such as earnings before tax (not earnings after tax). It is an effective method to avoid earnings management based on income tax expense and reduce the motivation on tax avoidance for SOEs.

We can make improvements in the following aspects. On one hand, this paper just interprets a specific method on earnings management based on income tax expense, and we haven't discussed the possible follow-up effects of this means (i.e., reactions to this phenomenon from capital markets and regulating departments) furthermore. On the other hand, restricted to the data available, this paper can only use effective tax rates to measure corporate taxation. However, there're some differences between income tax expense in financial statements and tax actually paid. As more tax-related data are disclosed, we can do some further researches.

**Key Words:** state ownership; income tax expense; earnings management

**JEL Classification:** M41, H26, G32

**DOI:** 10.19616/j.cnki.bmj.2021.02.011

(责任编辑:弘毅)